

集笛廬

曹汝芝著 · 李福

編 · 劉 · 慶

華 · 南 · 書 · 局



中國書畫出版社

集笛蘆

著拉巴庫·卡楊
譯 笄 朱
序 權 寶 戈



行 印 衣 桌 光 文

楊卡·庫巴拉自傳

我是在一八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舊曆)，生在離舊維萊伊斯克縣拉達希科維奇不遠的維桑卡大農場上。我整個的童年和青春時期，都是在鮑里索夫斯克和明斯克兩縣的流浪中消磨過去的。我的父親是契爾文辛拉地方的人，是屬於那些曾經被某位波蘭侯爵從田地上趕走的小佃戶羣中的一個人。從年青的時候起，他就在租佃的田地(耕種地)上工作。

命運把我的父親從這一處地方投擲到另一處地方，我後來的情形也是這樣。一八八三年他在地主鮑格唐諾維奇的猶塞福伏領地上，一八八七年在科辛諾領地上，一八八九年在地主土耳其曼斯基的森尼察領地上工作。一八九〇年，他暫時放下了在領地上做雇工的情況，到明斯克去，在那兒買了一匹馬

，做過一個時候的馬車夫。

一八九一年，他又重新回到塞里謝大農場的租地上去。一九〇四年我的父親去世了。在父親死了之後，母親就帶着孩子們遷居到女地主斯泰羅依濟娃的租地上去。

因此，我整個的少年時期，都是在別人的田地上，都是在經常依靠地主和在地主壓迫的情形之下渡過去的。

在各地漂泊的教師，教過我讀書識字。我跟我的奶娘學會了讀俄文。我的父親有一本日曆，上面的「審查通過」兩個字，特別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在離開明斯克不遠的森尼察國民小學裏讀過半個冬天的書，此後曾在明斯克的私立補習學校讀過一個時候：某一位老者在那兒爲一羣投考明斯克中等學校的學生補習功課，可是他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因此時常就只剩下了學生而沒有先生。後來明斯克實科學校校長沙莫伊爾的兒子和我一齊學習。可是結

果是毫無所得。雖然這所實科學校的校長允許我不經考試就可以入學，但是我的父親決定不讓我讀書，還是留在農場上工作。我並沒有被造就成爲一個很好的主人。我不喜歡農作，而時時刻刻總是帶着書，這些書是從父親那兒弄來的。這時我的父親已經惋惜沒有教我讀書；後來十五六歲時，我一個冬天就讀完了拜洛勒茲克國民學校。按實情講，我進這所學校的時候，我已比課程上所規定的知道得更多。

我在家裏管家、耕田、刈草、砍木柴，一直到二十一歲時爲止。

就在這時候，父親，弟弟和兩個妹妹都死掉了。這深深地傷了我的心。弟弟比兩個妹妹們早一個禮拜死掉。在安葬時，我才知道了羅馬加特力教僧的全部貪婪。當我去埋葬兩個同時死掉了的妹妹時，加特力教僧要我付出兩倍的埋葬費；他說，埋葬一個人就收一個人的費，另外再加一個人，就收兩個人的費。講真話，我在這之前就不怎樣信仰宗教，自從這位加特力教僧的

這場毫無廉恥的買賣之後，就把我信心的殘餘最後都打消得一乾二淨了。

我厭棄了在別人的田地上做事。我丟開一切，決定去找一份「輕鬆的」飯碗。我在釀酒工廠裏當了三年的粗工。我在那兒知道了從前所不知道的苦役。我丟下了這個工作，就到維爾諾去，當地正出版着一種「我們的田野」

報。我在維爾諾的圖書館和「我們的田野」報裏工作過，這之後就到了彼得堡，在契爾略耶夫的普通教育課程班上讀了四年書。從彼得堡我又回到維爾諾，編輯「我們的田野」報。一九一五年我不得不被疏散到莫斯科。一九一六年到了明斯克，從明斯克到了波洛茲克，再到了斯摩稜斯克。

我的年青的時期，是在非常艱苦的情形之下渡過的。我毫無選擇地讀着各種可能得到的書，我讀了很多的書，這種閱讀勾起了我的幻想；在我的心裏面時常存有着某種不調和。我始終不能將我四周圍的真實生活，和從書本裏所吸取的思想與印象的世界相調和起來。

沙皇的暴吏，想儘一切可能來窒死白俄羅斯的語言。我的第一本小書「蘆笛集」被沒收了，出版者還被傳到法庭上去。自由的創作活動，只有在偉大的十月革命之後才開始。只有列寧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才給了和我們祖國其他各民族並列的我們的人民，有了政權。在蘇維埃白俄羅斯，白俄羅斯的民族文化已達到高度的繁榮發展，這種情形是我在革命之前所夢想不到的。我的詩集出版了成千成萬本，我的詩歌在偉大的蘇聯的每個角落裏被歌唱着。

我應該把我的詩歌的繁榮盛開，歸功於蘇維埃政權和親愛的共產黨。

楊卡·庫巴拉

一九三八年

(戈寶權譯)

白俄羅斯人民詩人

楊卡·庫巴拉的生活與創造之路

——序朱筭譯的「蘆笛集」——

戈寶權

我不是詩人——不，上帝饒恕我。

這樣的光榮我一點也不尋找。

也許，我會編造出歌曲來，

人們只叫我——楊卡·庫巴拉。

在世上，光榮寵愛過詩人們，

給了他們多少的頌歌和桂冠……

我悄悄地唱着，——誰管這低低的聲音？——

楊卡·庫巴拉只在鄉村裏才被人知道。

若是沒有被歌曲溫暖的國家，

民族的命運便不知道詩人們。

白俄羅斯人同樣地沒有詩人。

雖然已讓楊卡·庫巴拉屬於他們。

——我不是詩人——

自從白俄羅斯的人民埋葬了他們的歌者和優秀的抒情詩人——楊卡·庫巴拉以來，已是整整的三年了，但是他所留給我們的珍貴的詩作，也正像誕

生了他的這個民族一樣，是永遠不朽的。這就使我回想起高爾基所寫的一篇短文，說意大利的人民爲了紀念他們的人民詩人喬望尼·帕斯科里，曾經在他的石像下銘刻了一排字：

「人是要死的，——但是人民是不朽的，而用自己的詩歌來震動了自己人民的心靈的詩人，也是永生不朽的」。

9

我想把這句話拿來應用在楊卡·庫巴拉身上，那是再確當也沒有了。詩人應該向千百萬人說話，應該和自己的人民共生息和成爲自己的人民的代盲人，並且也只有在那種地方，才存在着詩人的幸福和他最崇高的榮譽，遠在四十年前沙皇統治的黑暗的日子裏，楊卡·庫巴拉在他的第一首詩中，就叫出了這樣的聲音：

.....

讓我的力氣受苦吧——它了不得，——

兄弟們，我永世也不忘記，

俺也是個人，雖然是個莊稼漢！

只有那知道俺的生活的人，

他會明白俺痛苦的哼唉和叫喊。

讓每個人都來使喚我吧：

俺總要活着——因為俺是個莊稼漢！

——莊稼漢——

在這些詩句中，楊卡·庫巴拉表現出他和人民的血肉相聯，生息着人民

的喜悅和悲哀，爲人民叫出痛苦的呼聲。他在另一首詩中更有力地叫道：

我不是爲了你們，地主們，哦，不是的！

高揚起我的詩句

在自己親愛的故鄉，

在白俄羅斯的田野。

我不是爲了你們，地主們，哦，不是的！

我不是爲了你們，地主們，哦，不是的！

我是爲了那些生而爲貧農的人；

我和他們在一起，我們被

同樣的腳鐐所禁錮着……

我不是爲了你們，地主們，哦，不是的！

我不是爲了你們，地主們，哦，不是的！

我是爲了那些無權的人、不幸的人。

我在森林裏、田野裏，

已經聽見了他們對我的詩歌的友愛的回聲。

但不是從你們，地主們，哦，不是的！……

——我不是爲了你們（權譯）——

只從這首詩裏，我們就更知道楊卡·庫巴拉是怎樣的一個詩人了！白俄羅斯共和國的政府，當他創作二十週年紀念時（一九二五年）贈給他一個『人民詩人』的稱號，這決不是偶然的；只有這個稱號，才能更顯明地指出這位詩人的生活與創造的路程。

一 「在苦難中的行旅」

楊卡·庫巴拉正像他自己所說的：「俺是個莊稼漢」，是個出身自人民底層的詩人，而他的一生，也正是一條苦難的旅程。他一生的命運是悲苦的，其實這並不是他個人的命運，而是整個白俄羅斯人民的命運。在當時，白俄羅斯人民是生活在兩重壓迫之下：民族的和社會的。從前者講，他們是生活在沙皇暴吏和波蘭地主的鐵蹄與奴役之下；從後者講，他們是生活在無權無法的條件之下。他們時時刻刻遭受着殘酷的剝削與掠奪，因此饑餓、貧困、疾病就成了他們永遠的伴侶，而他們的言語更被禁止使用，視為是種「莊稼漢的語言」、「劣等的語言」；至於文化更不必說，他們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永遠是沉溺在文盲和迷信的狀態之中。這樣只有到了新的曙光，在全世

界六分之一的地面升起時，他們才得到了真正的自由解放，過着是自己的命運的主人的生活。楊卡·庫巴拉從年青的時候就目睹了一切，他體驗了社會的不平與民族壓迫的一切恐怖，他知道人類不幸的一切深度。

楊卡·庫巴拉 (Yanka Kupala) 的真名是伊凡·多明尼科維奇·盧策維奇 (Ivan Dominikovich Lutsevich)，於一八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新曆是七月七日)，生在舊維萊伊斯克縣維亞桑卡大農場的一個佃農的家庭裏。他的父親是個沒有土地的佃農，爲了尋找工作 and 租田地，「命運就把他的父親從這一處地方投擲到另一處地方」，而他就跟着他的家庭，走遍了鮑里索夫斯克和明斯克縣，把他的童年和青春在各處的農場上和地主的領土上消磨掉，這正像他自己所說的：『我整個的少年時期，都是在他人的田地上，都是在經常依靠着地主和在地主壓迫的情形之下渡過去的』。他的父親也會經一度想改變自己的命運，到明斯克去趕馬車，但是不幸的命運又把他擲回地主的莊

園，而在一九〇四年留下了妻子和兒女們死掉。

楊卡·庫巴拉受的教育也是非常可憐的，他最初學的是波蘭文，俄文是從他的奶娘那裏學來的。因為家庭貧窮和田地上需要人手的原故，他只能在鄉村的國民小學和明斯克的一所私立小學，讀過一個很短的時期。他雖然有一個機會可以進明斯克的實科學校，但是他的父親要留他在農場上工作，這樣只有到了十五六歲的時候，他才讀完了拜洛勒茲克的國民學校。至於進中學，在當時只能是一個遙遠的夢罷了。楊卡·庫巴拉這樣回想起他的童年：

「我的父親曾有一個時期想送我進中學，但它只成了一個難以實現的夢想。窮困迫使我學了另一種學問，這就是在地主的田地上誦讀勞動的悲哀的書，和用木犁及鏟刀來寫出自己苦痛的悲哀的小說」。他在詩中也這樣寫道：

貧困斷絕了我走向學問的道路，

我沒有能達到書本中的至賢至聖，

白俄羅斯的語言和人民的歌謠

我是從母親那兒學到——既沒有書本也沒有學校。

從童年，從不愉快的年代起，

白俄羅斯原野的空曠成了我的先生，

田地上發芽和鄉村中的閒話，

就帶給了我各種學問。

——我的學問（權譯）——

爲了幫助家庭，他從小就在田地上做活，一直到一九〇一年。這之後，他在釀酒工廠裏做了三年的粗工雜役，「才知道了從前所不知道的苦役」。他不久就又丟開了這個工作，到維爾諾的圖書館和當地的自由主義的報紙「